

从“广州”得名1800年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

□张强禄

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黄武五年，“广州”作为州级行政区划名称，首次见诸史册。一个名称的出现，并非单纯的行政分置，而是在社会发展、地缘和区位优势消长、建制沿革演变中渐次形成。

2026年，“广州”得名1800周年。溯其缘由，不止于从“番禺”到“广州”，更在于：它如何在三国吴分州的制度框架中重回岭南中心之位。在三国晋南朝的历史进程中，以“三江汇总”之区位优势，借“衣冠南渡”之时局便利，强化其作为岭南中心的引擎地位，为隋唐在广州设总管府（都督府）奠定坚实基础（此即“广府”之由来）。

从郡治番禺到州名广州

广州建城史有明确文献记载并经考古发现佐证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定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以南海郡为首郡，郡治番禺——“治”即治所，指古代地方行政机构的办公所在地，相当于今天的行政中心。

由此算起，至2026年，广州建城已2240年。

这是中央王朝在岭南确立郡县建置的起点，自此，岭南开始被纳入统一帝国的行政秩序之中。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秉承中原“择中而立”的都邑理念，选择在白云山下、珠江北岸修建“任嚣城”作为郡治。“择中”是先秦以来都城选址的基本思想，即依山面水、居中制衡，以利于政治控制与交通网络。

秦末天下大乱，龙川县令赵佗接任尉之位，统一岭南，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建南越国，增筑“任嚣城”，是为南越国都——番禺城。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后，把岭南三郡析为九郡，设立监察机构“交趾刺史部”，其治所设在羸陵（今越南河内）。元封五年（前106年），朝廷初置十三刺史部，交趾刺史部治所北迁至广信（今封开）。自此，番禺县隶交趾刺史部（后改称交州）凡九十九年。

西汉末，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十二月，刺史部由监察机构演变为一级行政区，改称“州”，交趾刺史部遂改为交州。东汉承西汉州、郡、县三级制。

东汉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将交州治所由广信县迁至番禺县，修建赵佗城为刺史治所，世称“步骘城”，至此，番禺县、南海郡、交州三级治所同处一城。此举重新确立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

三国吴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为交、广两州（析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至此正式诞生——

元代陈大震《大德南海志》云：“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为广州，州得名自兹始。”关于“广”字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说：一因州治由“广信”迁来而沿用“广”字；二因辖境东西辽阔而名“广”。如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所言：“广州一郡，屹为中枢，山川绵邈，环拱千里，足为都会矣。”

郡县重组与州域扩展

《晋书·地理志》载：“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立为广州。”南海郡辖番禺、博罗、龙川、四会、增城、平夷（今新会，由四会分出）、揭阳七县，而番禺县仍为州、郡、县治所在地。现广州地区当时主要属于番禺县和增城县地。

到西晋太康年间，广州已辖十郡、六十八县，其中南海郡领番禺、龙川、博罗、四会、增城、平夷等六县，州、郡、县治仍设在番禺。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陷入战乱，中原士族、官僚和文化精英规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由是，统治者增设了不少郡县。东晋南海郡，领县增加怀化、欣乐、西平（后两县在今惠阳一带）和高要等县，并由番禺县析置怀化县。两晋时期，今广州地区均属番禺县地。

南朝初，北方战乱，民众南迁，故依旧置郡县。

刘宋时期，广州辖十八郡，南海郡辖十县：番禺、怀化、熙安、增城、博罗、西平、龙川、高要、绥宁、始昌（由四会析出）。其中绥宁、熙安两县由番禺、增城分出。刘宋时广州地区分属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等县地。

南齐时，南迁士族最盛，南海郡的县数继续增加。《南齐书·州郡志》载有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博罗、龙川、西平、高要、新丰（由博罗分出）、河源（由龙川分出）、安远、济安等十四县。萧梁时，今广州地区属番禺、怀化、熙安、绥宁、增城县地。

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六月，析广州之地，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四州。广州直辖郡县虽有所缩减，但仍设有都督府管辖。梁朝末年，又析番禺县地，始置南海县。萧梁之世，广州领十一郡，其中南海郡辖番禺、龙川、博罗、河源、安远、新丰六县。今广州地区，仍属南海郡番禺县地。

南朝陈时，广州领十二郡，其中南海郡辖番禺、龙川、博罗、河源、安远、新丰六县。今广州地区分属南海郡番禺县和东官郡增城县地。

政治秩序、海贸网络与文化汇聚的生成

从这些层叠的建置变迁中可以看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政治地位在不断强化。而政区的稳定，也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目光从行政建置转向社会民生，就会发现，相对于颇为动荡的岭北，偏安一隅的岭南则大多呈现出“盛世丰”的平康局面。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战乱，大量汉人南迁，统治者为了安置部属增设不少郡县。但此时郡县地域狭小，辖境不甚清晰，且变更频繁，区域分布也多不合理。这也说明正是因大量北人南迁，且不乏世族官吏，才有增设郡县之巨大需求。

而坐拥“三江汇流、山海相拥”区域优势的广州，自东汉末年步骘迁州治至番禺，修建“步骘城”以来，其作为岭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强化，深深刻

印于历史长河之中。有意思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坐标的“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水系的称谓，大致也是在晋南朝时期开始孕育并在唐宋逐渐形成，这与长江三角洲和黄河三角洲水系的命名方式有很大不同，很早就体现出“广府”在岭南地理与文化中的引领地位。

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3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华夏重归一统。隋朝虽国祚短暂，但行政建置有革新，删繁就简，将汉代以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改为州（郡）、县两级。广州设总管府，最初治所在曲江，开皇末年移治南海县。此后广州地区主要属南海县地，南海县制由此始。《元和郡县志》云：“南海县，本汉番禺县之地也，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以其地置南海县，属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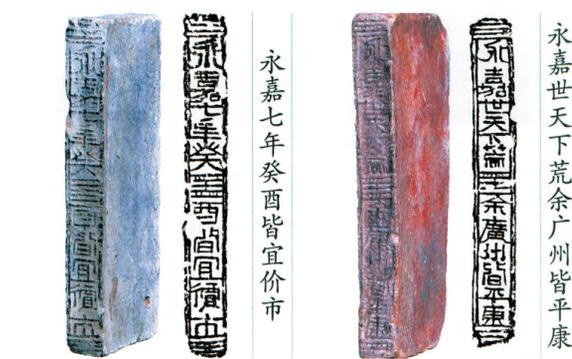
汉末三国，作为往昔核心地带的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安。虽然司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建立西晋，280年灭孙吴，结束三国鼎立，重新统一中国，但随后爆发的“八王之乱”（291—306）历时十六年，紧接着又是怀帝永嘉五年（311年）的“永嘉之乱”，随后“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于316年灭亡。由此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北方则进入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又开始长达27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

但衣冠南渡，北人南迁，置郡县、垦田野，长江以南，特别是偏重权力中心的岭南地区，由于社会相对安定，且地处华南沿海，海贸交通发达，农业、手工业、商贸等均得以长足发展。如许倬云先生所言：“而各处割据的势力，为了逐鹿中原，却都尽力发展自己的腹地，纷纷寻求更多的资源，也集合更多的人力。”广州出土墓碑上的铭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反映的就是这个天下大乱，《南齐书》中甚至还有“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的夸张说法（《南齐书·卷三十二·列传第十三》）。

秦汉时期史书记载，民间传说比较明确的在地广州的历史人物和古迹，不过有赵佗及朝汉台、越王井、南越国宫署遗址，以及著有《南裔异物志》的东汉言官杨孚和杨孚井等，为数不多。到晋南朝时期，有关广州的史料记载和文物古迹数量大增。东晋著名学者郭璞（276—324年）就说“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唐朝房玄龄等撰《晋书·吴隐之传》也提到：“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宝，可资数世。”现白云区石井街道白沙河边，还留有相传与东晋刺史吴隐之有关的石门“泉泉”旧迹。

广州别称“羊城”“穗城”的由来——“五羊衔穗”传说，也始于三国西晋时期，这一传说还与广州刺史滕修有关，清初大儒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有详述，明洪武十年（1377年）迁建于越秀区惠福西路的五仙古观，便是历代祭祀五仙五羊的谷神庙。

梁朝萧子显著《南齐书·州郡志·广州条》称：“捲握之资富兼十世，尉佗余基亦有霸土。”《艺文类聚》卷五三引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土教》语：“风序泱泱，衣冠鼎盛，州岳所产岂直明珠大贝



广州市西晋墓出土西晋永嘉年间铭文砖
图片来自《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馆藏铭文刻辞类文物选》，文物出版社

而已。”所称赞的就不仅是南海郡海贸的富足，更有文风的教化了。

岭南中医学在晋南朝也迎来关键发展时期。被尊为岭南医祖的“抱朴子”葛洪，“博学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晋书·葛洪传》）。东晋成帝司马衍时，他千里南行，本拟至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任县令，途经广州时被广州刺史邓岳挽留，从此隐逸罗浮山间，著书讲学三十余年，对后世岭南医药传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妻鲍姑（约309—363年）为晋南海郡太守鲍靓之女，精通灸法，以治赘瘤与赘疣闻名。史称葛洪在罗浮山仙逝后，鲍姑和弟子黄初平到广州越岗院，边修道边为百姓治病，世人称为“鲍仙姑”。今越秀山下三元宫内的鲍姑祠，便是后人为纪念她所建。

三国晋南朝时期，广州文教方面的繁盛，还表现在佛教的西来和逐渐壮大。得益于海丝贸易的发达，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东汉末期佛教即传入岭南，三国时广州城区开始出现佛教寺院建筑。著名僧人法显《佛国记》记其于东晋末年西行取经之后，以65岁高龄乘商船沿海路返回广州，因风暴海浪经九死一生的海上航行，最终在山东抵岸的历程。法显以广州为返程目的地，不仅是因广州地处南海之滨，为岭南最大都会，也说明当时广州的佛教规模和影响力已相当可观。

规模师也是在南朝时期经海上丝绸之路先到广州，然后前往建康（今南京），最后到嵩山少林寺传经布道的。相传他在荔湾区上下九附近登岸，故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如今下九路木塔寺始建于越秀区惠福西路的五仙古观，为世间的寺院都始建于晋南朝时期，可见当时佛教传播和文化交流之兴盛。

《南齐书·东南夷列传》所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州）、广（州）富实，积王府。”反映的正是交、广之地海外贸易与

交流的盛况。粤西遂溪、罗定和粤北英德南朝时期的窖藏与墓葬中，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银币、银碗、鎏金杯、金手镯等明显西亚风格的舶来品，亦可佐证广州之地商舶远届、瑰宝溢目的景象。

广州目前墓主人身份明确，流传有序且有后人的年代最早的墓葬，是番禺区大龙街道新水坑村将军山的南朝刘宋陈元德墓。陈元德（372—463）为东晋秦州南安郡源道县（今甘肃省陇西县）人，历任东晋孝武帝、安帝、恭帝三朝，以功擢升建康大将军。东晋元熙二年（420年），他隐居番禺县桂林乡宁仁里（今番禺区南村镇坑头白水坑）。

自1928年4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调查广州市东郊员村乡晋墓，以及1931年黄花考古学院发掘西郊大龙山晋冢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现广州地区经考古勘探发掘的三国晋南朝墓葬至少有六百余座，广州古城近郊分布尤多。作为都会的广州，其人口规模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是肇始于1952年3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黄文宽先生带队发掘和乡客村晋墓。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文末，还专门提到该墓出土的墓砖铭文，用以佐证王导对于“江南吴土尚得称康平丰盛”的贡献。

公元226年得名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建置演变和社会变迁，广州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积聚经济与文化力量，以兼容包蓄、海纳百川之势，从“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清·陈恭尹《九日登镇海楼》）的华夏边地成长为“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南海、交趾，各一都会”（《隋书·地理志下》）的广州总管府，城址未移，城脉永续，“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明·汤显祖）。

这一进程，不仅见诸史籍记载，也留存于文物古迹和考古发现及博物馆展厅当中，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痕迹。

一千八百年的过去，“广州”之名延续至今，其所指涉的，早已不仅仅是一座之城，而是一种在变动中持续生成的城市形态。

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中，这种历史所形成的结构能力，仍然构成这座城市的重要底色。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十三行风云：“巨富”潘振承如何让广货行天下

□潘剑芬

姓人士打工，在那里熟练掌握了西班牙语。历史学者范岱克在国外档案中找到了潘振承用西班牙文写给外国商人的信，字体流畅优美，证明其西班牙语水平较高。在其后的经商过程中，他还能以英语、葡萄牙语直接与外商交流。

这段经历给了他两样宝贵的东西：一是流利外语，二是不肯将就的心。

约1735年，二十出头的潘振承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去广州。为什么是广州？清代自开海禁以后，这里一直是允许外国人常年贸易的重要口岸。这是一座真正属于商业的城市。陈姓商人在此设立商行，自然也是看中了这块贸易圣地；骨子里带着冒险精神的潘振承也被吸引到此。

潘振承入粤后，进入陈姓“达丰行”工作。族谱记载：“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陈商喜公诚实，委任全权。”

广货“出海”：从诚信到创新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创立了自己的商行——同文行。此时正值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行商垄断了对西洋各国的贸易。同文行主要经营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它们是当时中国外贸中最大宗的出口货物。

这一年，他还联合其他八家洋行，向清政府申请恢复设立“公行”。潘振承被清政府委任为“公行”首任商总，并担任行商首领至其病逝，出任商总28年，是广州“一口通商”存在85年间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行商。其间，他对外开拓市场，推动同文行蓬勃发展，使之成为广州

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商行之一。

潘振承是如何从一个打工仔，跃升为商界领袖的？

首先，是诚信。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武夷茶，包装损毁严重，根本无法分清哪些是同文行的货。按常理潘振承可以推诿。但他做出一个惊人决定：二话没说，如数进行赔付。同文行一诺千金，其他行商竞相效仿。

1784年，美国第一艘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抵穗。当时十三行共有七名行商可作担保人，美方毫不犹豫选择了潘振承。一个新生的国家，把对华贸易的信任，交给了这位中国商人。

其次，是创新。为保证茶叶质量，他曾在福建武夷山建立大规模茶园，并配套茶叶加工基地。通过“茶叶基地+加工+包装+销售”一条龙模式，同文行出口的武夷茶品质极其稳定。由于潘振承及其后继者都极其重视货物品质，同文（孚）行茶叶、生丝等商品成为中外驰名品牌。法国拉罗歇尔城奥比尼-贝尔浓博物馆收藏有一张嘉庆年间以通草纸印制的外销画，画中有两个色彩亮丽的茶叶箱，箱上赫然印有“同孚名茶”四个大字，见证了潘氏家族打造的茶叶品牌享誉海外。

质量是基石，胆识是分水岭。潘振承留下许多敢为人先的故事：18世纪60年代，他拥有三艘帆船，以广州为基地从事东南亚贸易。这些船以向外国人发行债券的方式为航行融资——作为当时最早一批向外国人融资进行帆船贸易的投资者，其商业眼光让人佩服。英国画家乔

另一创举是率先在对外贸易中使用伦敦汇票。1772年，他在一笔巨额交易中以公司汇票汇往英国；1786年，又接受孟加拉汇票作为茶款结算。相较当时多用现银，他较早运用票据完成跨洋支付，降低风险，提升了资金周转效率。敢为天下先——他用每一次尝试，重新定义“中国商人”。

最后，是远见。潘振承知道，真正的生意，是人。他在家中宴请外商，品茶赏园，纵谈西洋近事。他的继承人潘有度视野继续扩大，把自己收藏的世界地图，用中文标注国家、城市和海港以供研究，并与外商“坦诚而自在地谈论宗教”，甚至通过外商加入美国“麻州农学会”，并与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通信，向邱园赠赠中国植物，成为中西植物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见证了振承与瑞典商人的友谊。据2007年7月央视《访瑞华人寻踪》，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里藏有两幅潘启画像和以他为原型制作的瓷人（瓷人是一对，官人身着官服，气度不凡；夫人相对而立，神态温婉。据考，官人原型即为潘振承）。

他留给城市的远不止财富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潘振承在番禺河南购置土地，广建屋宇祠堂。他还捐资修建海珠桥、环珠桥、跃龙桥。

便于乡里出行的善举，无意间也成了后世画家笔下美景。英国画家乔

治·钱纳利于1830年所绘铅笔画“Bridge at Honam”（河南桥），据考证即为海珠桥。清代摄影家赖阿芳拍下多张海珠桥美景。桥梁建筑艺术随着绘画、摄影走出了国门。

但潘振承留给这座城市的远不止桥梁。他深知，商人虽富，终非显贵。他倾力投资教育，培养子孙读书业儒。潘家后人，进士、举人辈出，诗、书、画、鉴藏，代不乏人。商业血液与文化风骨，在这个家族身上未有分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潘振承辞世。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里留下一段话：“他确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儿子一定能够保持商行的信用和经营，所以没有理由为他的去世感到遗憾。”

这或许是商业世界对一个商人的最高评价：斯人虽逝，信用长存。回看潘振承一生，他与广州早已千丝万缕交织；青年奔她而来，因她开放包容；中年在此成就，因她赋予视野与信誉；晚年将一生所积还予此方——他最终活成她文脉和风骨的一部分。

而其一手打造的“广货”，从来不只是茶叶、丝绸，更是诚信、开放、创新的商业精神以及潘家用百年家风做出的一种范式：财富的终极意义是滋养文脉、反哺乡土。

三百年前，一个潘振承和许多“潘振承”曾描绘商业精神底色；三百年后，这底色早已汇入广州血脉，在一代代人的奔赴中，升华为这座千年商都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作者系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羊城晚报

A6

理论

文史哲

2026年2月27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陈日升

校对 彭继业

编者按

2026年，“广州”之名走过1800载。从三国吴孙权黄武五年（226年）设州得名，到清代十三行“广货行天下”，这座城市始终在岭南大地上书写着开放与中心的传奇。

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特呈双璧：一文溯建置沿革，看广州如何从“番禺”古邑跃升为岭南政治中枢；一文追十三行巨富潘振承，观“广货”如何凭诚信与创新通达四海。从州郡治所到万商云集，从“三江汇总”的地理优势到“一口通商”的时代机遇，广州得名1800年的厚重与广货行天下的飞扬，共同勾勒着这座千年商都的生命底色。

历史从未远去，它就在我们脚下，在每一次对城市根脉的深情凝视中，生生不息。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潘振承玻璃画像，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藏 潘氏后人供图

如果一贫如洗，如何逆天改命？300多年前的福建青年潘振承，用他的一生给出了一个答案：去广州。

这是一个“穷小子”漂洋过海，最终成为“巨富”的真实故事。这故事动人的不只是个人奋斗，更是一座千年商都与“异乡人”之间的双向奔赴。

一个福建青年决定去广州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一个贫困家庭。他是长子，有四个弟弟。潘家穷到什么程度？他儿子潘有为后来写诗回忆当年困境：“家贫藜藿苦不供，身披敝絮雨辄烘。”

为了活命，少年潘振承出海当船工。“风餐露寝为饥驱，海腥扑面履气粗”，风浪都在他的青春里。

但他不甘于此。族谱记载，潘振承“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清乾隆时期在广州从事贸易的一位法国商人记载，潘振承在马尼拉度过了他的青年期，为一位陈

